

佐助尼克遜總統

抉擇外交大計的葛辛基博士

袁道豐

在美國政府中，除總統外，一位高級官員是否擁有權力，就要看他能否具備下述三條件：(一)經常看見總統，(二)向總統條陳在他職守範圍內的意見，(三)供給總統必要的情報。亨利·葛辛基博士 (Henry A. Kissinger) 對這三條件均兼而有之，宜其為在華府政界中紅得發紫的人物。

就外交方面說，美國總統可分三種類型：(一)對外交自己有偏好，如甘迺迪及尼克遜是。(二)歡喜內政基於外交，一般政客出身的總統如詹森是。(三)對內政外交均無所偏愛，一視同仁，如艾森豪佛是。他是一位大將，兩樣都不是他的內行。有人說尼克遜總統對外交興趣那麼濃厚，簡直自己就是國務卿 (即外交部長)，葛辛基的才學均擅長外交，且研究深博，與總統可說是相得益彰合作無間。

葛氏的官銜是「國家安全事務的總統助理」(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) 簡單言之，是外交顧問。不過白宮 (總統府) 的顧問，與有些國家的顧問不同，並不是「顧我則笑，問非所答」的閑職，而是整天工作十六小時的忙人。人家週末有兩整天休息，而他在星期六還得工作。就是在星期日，他無論到任何地方都得把住址電話留給白宮的值班官員，以便隨時保持接觸。因為如有國際重要事變發生時，他應該首先接到情報。由他斟酌與搜集必要消息後，報告總統。

普通說，一個國家的駐外使館，探討當地政界人物，軍界、學界、商界、新聞界等的聞人的背景，為重要任務之一，以供必要時的參考。作者曾細閱葛博士所有的著作及報誌評述他的專文

，認為這位顧問對美國外交決策與國際局勢不無影響，爰草斯文，或於國人對美國情形的瞭解，有所裨益。

德國猶太，少年逃美

葛辛基於一九二四年生在德國。他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教員。過的是中等階級的生活，一位教書匠當然不會有什麼財富。希特勒登台執政後視猶太人為眼中釘，必欲去之而後快，殺的殺，囚的囚，幸運的逃亡國外，財產損失，難以數計。父親被迫退休後，深知德國已非久居之地，便於一九三八年挈妻和兩位兒子逃到美國。其時亨利葛辛基不過十五歲。

全家雖安抵新大陸，可是父親找不着教書的職務，語言隔閡當然是大問題，無已祇得在一

間公司工作，生活頗為困難。亨利懂得一些英法文，便在紐約進了華盛頓中學。

亨利在德時不過是一個普通學資的學生。現在八十二歲的老父卻記得兒子是一神童，發現他年幼時便構思勤敏而合理。他歡喜足球，一有球賽，他便一溜煙地離去家庭了。但是他也歡喜圖書館，常埋頭案上，有志於學。

大約是地靈人傑之故，亨利在華盛頓中學是一個優異的學生，功課都是A。十九歲（一九四三年）他取得美國公民籍。其時大戰方殷，他立即被徵召入伍，從軍四年，不久，入軍中反間諜局任詢問員，從事詢問德國俘虜的工作。不久，他以一班長的身份，做德國某一縣的軍事管理員，那時候，德國戰敗一部份已由美軍佔領。因破獲納粹間諜有功，他領得「銅星」獎章。

他在德國美軍佔領區內，任美軍情報學校的德國近代史教員。這是在戰事終止的時候。他的軍階不過是班長，而學生都是中校階級。一九四六年他乃離去軍界，變為一文職的教官。年薪一萬元。在那時可算是相當高的報酬了。

這位年輕人很知自愛，頗有大志，並不以高官厚祿的現狀為滿足，時常感到「我不懂什麼」。便毅然解職，離德返美去進最著名的哈佛大學。這一來，便與哈佛結了不解之緣，成為他學問事業的根據地。

他在哈佛領有政府發給的獎學金。人家要四年才能學成，但是他三年便畢了業，主修政治。可見他天資聰穎，好學過人。難怪他畢業時領得「最高榮譽」的獎章。一九五四年他領得哈佛大

學的博士學位。

他在學術方面是個脫穎而出的人物。一九五一年還是研究生的時候，便任哈佛國際關係研究班的主任；一九五四年任該校政治學系的講師，一九五七年陞任助理教授，一九五九年副教授，一九六〇年國際事務中心教授；一九六二年政治學教授。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，他出任總統外交顧問，他並未離開哈佛。就是現在他仍是請假性質。該大學對其學人受政府重用，效力國家，照例是給予種種便利的，何況這對學校為一莫大的榮譽。

學生對葛教授極歡喜，他給他們的油印參考書單總是十幾頁。他歡喜教大學生甚於教研究生，因為前者肯問而喜挑戰。近年來因為聲望日隆，課外活動太忙，他的功課常須請人代理。一般同事雖佩服他的才學，但不免感覺他並非純粹哈佛的學人。而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，也不能做到盡其所能的地步。

他雖至去年才實際充任白宮要職，但是早年便充任各機關的專門顧問。還是研究生的時候，便開始了他的課外活動，如行動研究局，心理戰略局，行動連繫局，聯合參謀部武器鑑定局，國家安全會議，武器統制與軍縮局，與國務院等，他都會做過諮議的任務。

從一九五四年起他開始撰文在著名雜誌發表。寫了五本書，其中最著名者為『原子武器與外交』（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）這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。一時洛陽紙貴，爭相傳誦，評為凡是留心國際政治者必讀的

著作。因為在此以前，還沒有人對原子武器與外交的關係作過有系統的深入的研究。以是立刻引起全世界的注意，而他乃變為一位著名人物。美國這國家有一點很特別，無論何事都歡喜人發掘與創造。一鳴驚人，全國傾服。一篇好文章或好著作立刻可使著者成名，致富。唱一首名曲也立刻可使歌唱家出人頭地。至論科學的新發明，更成為全國歌頌與獎金的對象了。

葛博士曾在一九四九年結婚，但在一九六四年此離，有子女各一，均已十歲左右。他現在是一單身漢，可以日常工作十數小時，否則美國太是會鬧家庭革命的。外交顧問年俸四萬元，有白宮的汽車與司機，比當教授好多了。但問題是職務有重大意義，够令人興奮，而且是學得其用。

總統求才若渴，延入幕府

美國不少政要與企業歡喜延攬人才，予以重任，不管他是否親友或黨屬。這是賽姆叔的偉大處，也是國家能够達到如此富強的關鍵。

比方尼克遜與葛辛基生平祇遇過一次面。據葛氏的回憶，是在兩年前一個聖誕節的場合。他們倆都不歡喜鷄尾酒會，也想避免無聊的瑣談。一九五七年葛氏發表他的名著『原子武器與外交』一書時，尼氏任副總統看了會致短簡表示讚佩，並無下文。從某一方面言，兩人在某一時期還處於敵對的地位，原因是葛與紐約州長羅克佛洛私交頗篤。一九六八年羅尼兩氏在共和黨競爭為總統候選人，葛為州長的外交顧問。羅對外交的主張大多出自葛的構思設計，裏面抨當擊時的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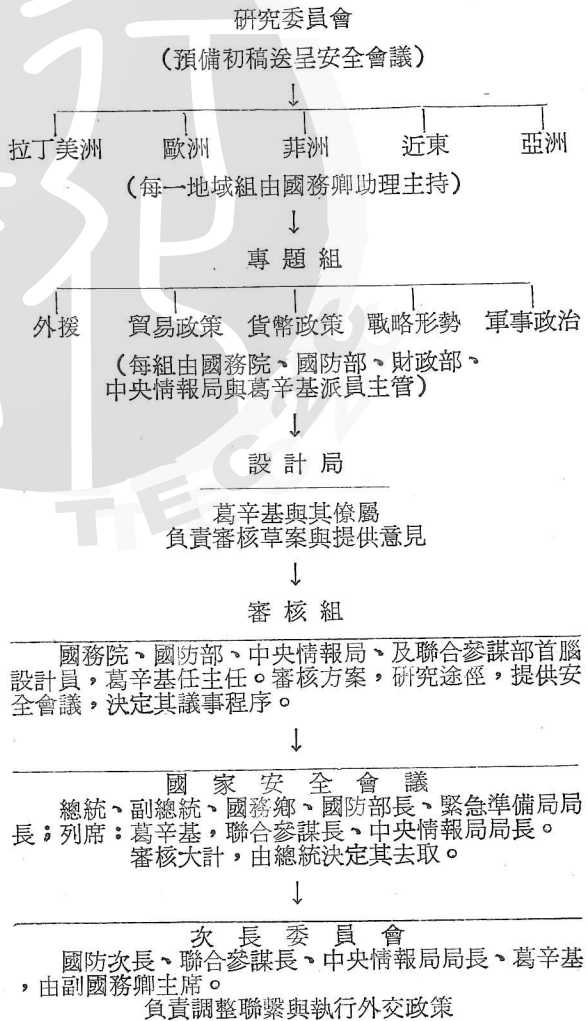
森總統固所在皆是，但不滿尼氏的外交方案亦顯然可見。

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大選結果，尼克遜當選為總統。翌年正月就職。在此期間，他網羅黨內外人才，充任政府要職。他曾邀請葛氏到紐約談話兩次。第一次，他便表示請他當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，葛受寵若驚，出於意外，沒有接受，但願考慮。到了第二次，兩人再度談話，交換意見後，才接受下來。

葛氏處事敏捷精幹，好像胸有成竹似的，立刻遴選國防外交兩部的年青幹員——大都是第一流的專家——到白宮充任其幕僚。國務院看他這樣來勢汹汹，擯去人才，勸他休手。有些原在總統府任職的民主黨幹才，原來預備辭職的，看他作風高超，表示佩服，也願意留職。總統就職時，有些部的次長等因民主黨人已去職，尚空空如也，而葛氏的幹部廿人却全副武裝人馬齊全，給人家以極良好好印象。毋怪乎輿論盛稱他的任命是新總統最成功的適當人選。

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是外交的最高決策機關，是在一九四七年杜魯門做總統時成立的。組成份子為總統，副總統，國務卿，國防部長與緊急準備局局長，歷屆總統對此機構用法不同。沒有安全會議以前，羅斯福歡喜在夜裡爐邊談話，處理國家大事；杜魯門與艾森豪佛均重用這機構；甘迺迪嫌其人多言雜（因尚有列席人員），易洩機要，歡喜與機要官員作個別談話；詹森更乾脆，每星期二邀請國務卿與國防部長舉行午餐談話。這些談話都有一大缺點，就是所談何事，有無

決定，根本沒有書面紀錄使後來者無從參考。尼克遜原是艾森豪佛的崇拜者，乃決計恢復安全會



議的威嚴與效用，與葛氏商定改革其內部組織如下：

看了上圖之後，我們可以知道葛辛基所處職位的重要，有人說他是政府中的第二位要人。

為什麼尼克遜重用葛氏？論者說他們倆性情相同；沈默寡言，熟思遠慮，彼此對外交都有熱情的偏好。葛的長處是思想新穎，頭腦清晰，有眼光，有分析能力。他並不長於口才，以說服勝人，他的英語便還帶有德文的口音。他起初對總統因初次相處頗感疑懼，現則融洽無間，忠誠以待。他說總統「做事認真，有條有理。他細閱一切送呈的文件，態度沉着，應付事變，我非常尊重他，感覺和他容易相處。假如我有虧職守，失敗

以終，其咎在我」。

不遭人忌是庸才

雖是有才有學，但一步登天總不免要引起他人的妬忌敵視。人究竟是人，無分畛域與膚色，還逃不了這人性。科學縱令萬能，也改變不了它多少。何況葛辛基與尼克遜祇有一面之緣，並無絲毫的私交關係？

因此，葛氏一入白宮後，華府政壇便說他的職位重要超國務卿與國防部長而過之，並已與他們發生磨擦。連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爾摩辣

特 (J. William Fulbright) 也恐慌起來，說「照國家安全會議的新組織，許多原屬於若干政府部門的重要事務都被它移過去了，而這些部門有許多是對國會負責的。」總統對政治搞了多年，深知外界對葛氏的疑忌不可長，連忙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斷言：羅吉斯是真正的主要外交顧問，國務部是執行外交的主要機關。

葛氏之所以特別見重於總統，國務卿羅吉斯對外交完全是外行，確是一大原因，儘管他在艾森豪佛總統任內曾做過大官。但是他是總統廿年的老朋友，關係密切，葛氏也深知底細，不敢大意。因此，兩人尚稱友好。可是在職務或技術方面，總免不了會生糾紛。比方最近的兩任總統視外交是他和國務卿兩人的事，現在却把外交重心轉移到國家安全會議了。而葛博士位居要津，舉凡安全會議的議案，須先經他審核和提供意見。在他看來，這是「國家安全事務總統助理」的職責。凡是總統所應知的情報與決策，他有向他詳呈的責任。過去兩位外交顧問如 George Bundy and W. Rostow 都沒有享受這樣的大權。話說尼克遜就職前，有一次在紐約舉行新政府重要會議。羅吉斯發言謂：國務院既向來職司外交，對此一項便應有主管地位。但他冷不及防的被葛氏來一反擊，說：現在國家安全會議既是外交抉擇的重心，那末，如果國務院要主管審核，其他組成安全會議的部門豈不是也可以作同樣的要求嗎？國務院對此至今仍有餘怨。

國防部長雷爾特 (Melvon Laird) 是會連任數屆的眾議員，一位老政客，手段辣而深沉陰

險，是一位不能輕碰的大員。外交與軍事關係密切，有時外交要靠武力來撐腰，但葛辛基既以外交學見長，有時也深知在內交方面運用外交手腕，故與雷氏尚能相安。實在說，他與國防部並無如與國務部的那種正面衝突。

葛氏畢竟是聰明人，知道自己的重要職位容易引起他人的妒毀。因此，他說：「假如你去問國務院和國防部的一些青年人，你會發現他們說我奪取這兩部的職權。但是假如你去問該部和我同樣官階的次長們，我相信你會發現現行制度實暢行無阻。」

有人以之詢問國防部次長派克 (David Packard)。他說：「葛辛基可以節省總統許多無謂糟場的時間。元首不必向每一部門的首長細問根底，因為他已經把詳細情報預備好了。他想到總統所做的是什麼。他有一個極具實效的小妙法，就是與人討論問題時，他總會說：「我願意做魔鬼的辯護人。事實上，他把各方面的意見都綜合起來，甚至我知道他個人的立場是怎樣的。」

又有人以之問副國務卿李查遜 (Elliott Richardson)。問他葛氏處理安全理事會審核組的態度如何，他答：「亨利處事極其公平，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發怒或疲倦。」

葛氏很知自斂鋒芒，不驕不矜。爲了避免有關公要疑懼，他對自己的任務這樣描述：「我在白宮樓下並不籌劃政策。如果一種政策被視爲我個人的政策，那我就失敗了。如果部長們意識我利用職位，調整情報，使其影響抉擇，接近我

的觀點，那末，我的實效便完全消失了。」他又說，「我的最低限度的任務，是從政府裡面或從最優良的專家中發掘有關資料，整理清晰，送呈總統與其重要顧問。當然，我不能狡辯說我沒有我的意見，尤其是受總統垂詢的時候。老實說，外交是我的本行，如果我說對某一件事應該做的事，全無意見，豈不是荒天下之大唐？但是我的最重要責任是向總統條陳意見，讓他去選擇決定。對此一任務，如你想做到無虧職守，唯一辦法便是把自己不算在裡面。唯一的事你不能做的，便是制定外交政策。」

無疑的，葛氏的地位，一方面須靠自己長於應付，他方面，最要緊的，須靠總統的信賴。他與尼克遜相處已經一年多了，朝夕與共。結果如何？最好的解答，莫過於一白宮內幕人士的觀察。他是尼氏的多年親信，現在總統府擔任類似參謀長的職務，名叫 Robert Haldeman。他說：「在極短時期內，亨利（美國人以名相稱，表示親切）會與總統培植了一種極親密的關係。他們的私交很好，彼此相處和洽。亨利極其盡忠職守，現已成爲一很可信賴的顧問了。他與總統同樣思想敏捷而清晰，總統不歡喜人家囁嚅贅言，歡喜對事提綱挈領，亨利便熟悉此套。當總統要決定一事時，常提出一連串必須速答的問題，亨利便早先準備好了。在總統週圍中，很少人可以做得這樣好的。」

因爲得人和，葛氏在政府的地位，一天比一天重要。比方去年底，國家安全會議組立一「國防計劃審查委員會」，會員爲副國務卿、國防次

長、聯合參謀長、預算局局長、經濟顧問會議主任，以葛氏爲主席。這機構是相當秘密的，其任務爲籌劃國家的軍事費用，軍費對外交的影響，及其對內政經費的調整配合。這無異把葛博士的任務範圍擴大到軍事與內政了，所謂能者多勞，古今中外皆同。

如果總統信賴，他人妬忌，豈奈亨利何？

工作勤謹 應付有方

葛辛基不僅有才學，而且做事很有魄力，非常勤勞。每天早晨七點四十五分便到了白宮，先參加總統高級顧問談話會，這延長至八點十五分。有人說笑葛氏照例到會遲九分鐘。八點半至九點，其他顧問（葛不在內）與總統會談。準九點，他進元首辦公室，報告過去廿四小時的國際事變與情報。這種會報沒有時間的限制，有時十分鐘，有時一小時，甚或過之，這要看外交局勢而定。但是他離去總統辦公室時，總是手携一大束卷宗。日間，兩人時通電話商談。有時候，在晚間總統邀他到辦公室，作長時間的談話，一星期有一二次。夜闌人靜，比較輕鬆。葛氏每日總要

搞到午夜才能回家。他忙到這種程度，甚至幽默的說：「下星期是不會有國際大事變發生的，因爲我的日程表已經滿了。」

國家安全會議一星期開兩次會，這也使他忙上加忙了。

美國人常說在美國有兩種事最難做；一是總統二是紐約市長。在深夜正在酣睡時電話鈴一響會聽見人說：「對不住，總統，我叫醒你……」

這是絞盡腦筋的大事變發生了，總統便整夜不能安眠。前任總統詹森最近在電視述其回憶，便談到這點。在他現時安靜悠閒的鄉居生活中，倍感其辛酸滋味。

下面我敘述一件重要事變在夜裡發生時，身當其衝的葛辛基是怎樣應付的，也就是說整個國家安全會議是怎樣行動的。去年四月十五日美國一架偵察機 EC-121 號被北韓擊落。星期二早晨一點前五分，國防部接到這消息，即於一點五分鐘通知白宮的「局勢室」（即國家安全會議的交通中心），一點七分，值班官員通知葛氏的副官某上校，一點十分由他電話叫醒葛顧問。

葛隨即要國防部詳報偵探機的使命和調查被擊落的可可能地點。二點二十五分，得悉北韓已宣佈擊落飛機，他問國防部報告援救飛機師的情形及軍事行動的緊急計劃。四點擊落飛機事已證實，即喚醒總統報告情形。七點可以電話與總統談話，八點手携地圖、國務院與國防部初步應付事變的報告晉謁元首。本來擊落一架飛機沒有什麼嚴重可言的，祇因上年被北韓截留一艘偵探船，乃變爲嚴重。

葛氏否認總統的立即反應是主張軍事報復之說。其實元首祇囑他迅向國務院與國防部獲得軍事外交的應付辦法。當日下午，他召集並主持一次長階級的審核會議。由晚六點至翌晨三點，擬定可能採取的應付辦法，以便星期三晨呈報總統。

星期三晨國家安全會議開會，這尙祇限於交換情報的性質，下午的會議就重要多了。參加的

祇總統、國務卿、國防部長、聯合參謀長與葛辛基。有好幾天，軍部方面力主用飛機轟炸，對北韓施行報復。

在開會期間，尼克遜很小心，從不透露他個人的意見。須知美國官場有若他國，諂諛逢迎者大有人在，縱令私下所持的見解完全與長官的不同。星期三下午總統仍未決定應付途徑，與葛氏作長時間談話後，才決定另組一緊急事變籌劃委員會，由葛氏、國務院、國防部、聯合參謀部及中央情報局幹員組成之。星期四，星期五，他們擬定兩種應付綱領，一是軍事的，一是非軍事的。前者可能引起與中共，甚或與蘇聯的鬭爭。

星期五中午，尼克遜電視廣播政府已決定對北韓提出抗議，嗣後偵探機將有武裝飛機保護。內幕人士稱這祇是初步的應付辦法，軍事方面可能還在後面。

當天下午，總統叮囑葛氏就國家安全會議會員中，個別問他們衷心的見解是否與在會場公開發表的相同。因爲一般輿論對總統的電視廣播反響甚佳，而軍事報復又可能引起與中共蘇聯的衝突，大都表示不要冒險，尼克遜也就不了了之。

但是有人問在這次事變中，葛氏是採何種態度的。聽說某官員主張迅速報復時，他會這樣辯答：如果要轟炸北韓，這也不必匆忙，凡事與其急躁冒火，倒不若冷靜沉着。要激動戰爭，老是容易的，但要止戰可是難之又難了。據熟悉葛氏的人觀察，要他爲了一架飛機的損失，而與中共蘇聯鬧出大禍，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。

葛氏的外交見解

自進白宮以來，他沉默寡言，從來不公開發表意見。他的職位既如此機要，守密實為第一要著。但就作者所集資料而言，他的外交見解可以概述如下：

(一) 歐洲——看他所著的五本書很容易發現他的基本背景是在歐洲。他對這方面的情形，實在知之甚稔。這也難怪，因為他生在歐洲，學說理論也注重歐洲。

去年二月下旬，尼克遜訪問歐洲，到了英法意比德諸國。作者在紐約聽見這消息，頗為驚異。因為一位新總統剛就職不到一個月，便赴他國與其領袖從事外交談話，不免有點冒險。美國報誌持此意見者亦復不少。但是他居然凱旋歸來，對過去歐(西歐)美間的稀疎關係，做了一番彌縫工作。這一方面證明總統本人對外交極感興趣，經常密切注視；他方面，葛顧問的主張得到了相當的成功，一年來尼氏出國，他總是形影不離的。

在他所著『一個重建了的世界』一書中(A World Restored)葛氏很佩服拿破崙戰爭後，奧匈帝國的首相梅特尼克(Metternich)和英國的首相卡斯梯里利(Castlereagh)甚至後來鐵血宰相俾斯麥，他們總算維持了歐洲的均勢，而由此均勢，維持了歐洲的相對和平，達一百零年之久。所以然者，是大家對當時的制度表示尊重愛護。儘管彼此有爭執，但認為制度的維持比較重要，犯不着因小失大。現在這種制度不存在

了。共產主義的國家，對其他任何制度均視同仇敵，應在摧毀之列，難怪我們這一代老在戰禍的邊緣上過活。

歐洲的主要問題是德國的統一問題。八千萬的純一民族，語言同，文化同，傳習同，硬要把它分成兩塊；東德(共產國家)與西德。當然，廿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，都是它激發的。除英國外，其他歐洲國家大都嘗過疆場戰敗或國土被佔的慘痛滋味，誰也對它懷着仇恨與畏懼的心理。它雖戰敗，但在歐洲，西德現在是最富最強的國家。無論是仇視的共產國家，或是友善的西歐國家對它的統一都談虎色變不敢贊同，不管是東德或西德出來主持統一。要不是蘇聯在東德屯兵數十萬，東德共產政府早就垮台了，德國也早就統一了。克里姆宮最反對它的統一，也最反對它擁有核子武器，爲了這兩件事，蘇聯必不惜一戰。很奇怪而又矛盾的，就是西德如想與東德統一，便得摧殘現狀，而她參加的北大西洋公約則旨在維持現狀。葛辛基在他所著『苦惱的夥伴』(The Troubled Partnership)一書中，曾絞盡腦筋，想出一個十五年計劃，依序前進，讓東德人民選舉自決，但最後他也承認這也不容易做到。不過西德與日強盛，民性亦強悍愛國，如果對其統一希求抑制過甚，結果恐將激起極端國家主義的復興，有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納粹運動一樣。葛氏認爲防止的辦法，最好是西方國家能瞭解西德在心理與政治方面的歧途，並促成它參加範圍較大的國際結合。

北大西洋公約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史太

林咄咄逼人，紅軍進佔了東歐國家。爲抵抗其西侵計，美、英、法、意、比、荷蘭、丹麥、冰島、盧森堡、加拿大葡萄牙和挪威十二國簽訂互助公約。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，嗣西德、希臘與土耳其亦參加。如簽約國中有一國遭受侵略，其他簽約的國應起而相助。

在那時候，這些國家在戰後瘡痍滿目，需財孔亟，處處需要馬歇爾計劃(Marshall Plan)的援助。而美國軍力亦最強，它們也最怕賽姆叔不再過問歐洲，復行其光榮孤立政策。因此，它們俯首就命，造成了美國的盟主地位垂廿年。嗣歐洲國家經濟日漸復興，獨立思想亦日漸抬頭，均不願長此貼服於美國領導之下。戴高樂將軍統治下的法國乃於一九六七年迫令北大西洋公約——即美國在法境內的一切軍事設備拆除離境，連聯軍統帥部亦被迫遷至比國。法國雖至今尚未宣佈脫離公約，但其軍力已不受聯軍統帥的管轄。匪特此也，近年來法國在外交方面處處與美國爲難。

葛辛基批評美國外交犯了嚴重錯誤，說廿年的盟主做上癮之後，便大權在手，一點不肯放鬆，任何軍事首腦非要美國人做不可。其實，聯盟機構既已牢固，有些地方便不妨讓人分嘗一鱗，他覺得甘迺迪與詹森對盟約瞭解不徹，伸縮性也不够。須知美國外交的成功，一大部分決之於大西洋區域，千萬不要過份預預它們的政治經濟，有許多地方，大家可以共同合作的。葛氏的錦囊妙計如何，非局外人能知其詳，但尼克遜訪歐於前，英德總理與法國總統又已或將聘美於後，則

可知彼此間的國交似漸趨改善。

美蘇關係——美蘇交惡已經有了五十年的歷史了，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兩國雖聯合抗德，但貌合神離，各懷鬼胎。這基本原因何在？葛氏覺得這是應該探討研究的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，馬克斯、列寧與史太林一再教訓其弟子徒孫，這在思想方面已奠下兩國仇視的根基。

但最大的障礙還是蘇聯領袖們的品格和氣質，他們都是冷酷，殘忍，熱中權勢，而不講人情的。史太林把列寧的親信及仇己的政敵，一律格殺勿論。克虜赫夫一登台，把自己的恩人 Kaganovich 置諸高閣，而把剛協助他鞏固政權的國防部長 Zhukov 元帥免職。現在克里姆大權在握的 Brezhnev 和 Kosygin 都是克氏一手提携的人，一不愜意，便請老克滾蛋。結果，共產黨秉政了五十年，迄今尚未制立一合法交代政權的制度。和這些人開外交談判，欲以私人友誼，求其妥協，豈非緣木求魚。他們對自己共患難同信仰的親戚朋友尚不講人情，同一生祇碰數次面的外國政要或外交代表更有何情感的可言？他們祇知冷酷的事實與利害。傳統外交有時能够成功，是因為大家注重法律和「取與給」。但是他們是不講此套，祇知取而不予的。他們說的話也不能算數。史太林說得好：「同外交代表在一起，話與事實是要分開的，話是一件事，行動又是另一件事。一位誠實的外交官等於乾涸了的水」

全世界現在是兩極世界 (Bipolarity) 即兩個超級強國稱雄世界。在軍事方面，這種對峙形

勢是一時不會變易的。但在政治方面，却是多極世界，就是說除兩大強國外，還有其他國家其中有些是盟國有些是中立國家，更有些是剛由殖民國崛起的新興國家。弱小盟國深知它們的存在是美國或蘇聯的利益，用不着多方或過份俯順。其他國家則知兩強衝突，都得向它們討好。結果東歐共產集團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有破綻。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如在東歐發生，是指擺脫蘇聯的束縛，這對西方是好的。但這種運動如發生於非洲或拉丁美洲，這是反美運動。可見多極世界並不一定可以保障國際秩序。反之，因為文化、目的、期望與過去經驗的不同也不易促成國際均勢。

蘇聯外交時而硬化，時而軟化，純視其內政與國際情形而定。但就在軟化時，也沒有與西方竭誠解決基本爭端。美國與她有很多重要問題須待商決，但其成敗有賴於(一)北大西洋盟國願放棄目前利益，而知為遠慮大處着想，(二)能想出一共同的具體計劃。共產集團的分裂不失為一個機會。

原子戰爭——葛辛基是以「原子武器與外交」一書出名或起家的。全書四百五十頁。其實，這書是美國外交學會邀集三十餘位將軍、政治家、外交家，及各界名流，費了一年半的時間，研究而成的。他負編撰之責，當然，書中有些分析、見解，和結論是他個人負責的。他現年四十六歲，那時他不過三十二歲，可以說是少年成名。像這類書，當時在全世界恐怕是第一本。

他描述科學技術的發達，武器的日新月異，使國際關係與人類安全起了一大變化。一顆輕氣彈 (十個 Megaton，等於一千萬噸的爆炸力)

五倍於大戰四年在德國施放的炸彈，一百倍於轟炸日本的炸力。美國與蘇聯都擁有互相摧殘的原子武器。葛氏發現武器愈兇猛，使用的可能性亦愈受限制。當蘇聯沒有原子彈 (一九四九年才開始試炸)，而美國單獨佔有的時候，後者並沒有利用這種優點，韓戰便是一例。作者覺得越戰與北韓截留電子偵探船 Pueblo，更是顯明的例子。

美國自立國以來，本國領土從未遭受威脅。但現在因洲際飛彈及原子武器，它本身也可能嘗到摧毀慘況的滋味了。故今後唯一保障國土安全之道，祇有大量製造飛彈，使敵國不敢輕擧其鋒。這叫做阻力 (Deterrence) 美國是一民主國家，總統因受憲法束縛，是不容先發制人，對他國取突擊攻勢的。因此，它的戰略是全面反擊，先讓人家打了一拳，才以全力還手。這就等於說雖先讓敵人摧毀，但尚有餘力摧毀敵人。並且祇有擁有可以摧毀敵國至不能忍受的原子武力，才能使它知難而退，不敢輕啓戰端。

美國的原子戰略是常變的。艾森豪佛總統時候主張採取全面反擊戰略，因此，常備軍大受裁減，好像全世界沒有戰爭則已，一有大戰，便是原子彈滿天飛大家同歸於盡。但是美蘇兩國，除非國土被侵，生死存亡有關，誰肯犧牲自殺？

葛辛基覺得全面原子戰雖不會爆發，但局部戰未嘗沒有發生的可能，而最容易發生的地帶是在歐洲。美國在西歐屯兵三十萬，連大西洋盟國的軍隊加在一起，都不能擋住蘇聯紅軍和其衛星國家的強大攻勢。因此，他主張局部 (即有限制的) 原子戰或戰術原子戰，唯此，可以迫使紅軍

不能前進，佔領西歐。這種戰術利於美國，因為部隊要小，行動靈活敏捷襲擊要極，頗似海軍戰術。蘇聯的政治社會組織與軍人的氣質及訓練，都不宜於戰術原子戰的。

不過現在的戰術原子彈雖不及戰略原子彈的兇猛，但也未可輕視。大的已超過美國在廣島長崎施放的炸力。如果雙方互炸起來，以德國人煙的稠密及其他盟國幅圓的微小，那經得起戰術原子彈的轟炸。因此，西歐國家對此不無疑懼，它們寧願有全面原子戰，其國土或能保全。不然，它們祇有兩條路可走，不是投降，便是摧毀，這是它們與美國同林異夢之處。但是它們也沒有辦法，英法兩國的原子武器既遠非蘇聯之敵，還得靠美國的屏障來阻止紅軍的西侵，這就是邱吉爾所說的「恐怖均勢」。

一九六一年葛氏又寫了一本書，名叫「選擇的必要」(The Necessity for Choice)，對『原子武器與美國外交』又有精闢的敘述。他對局部原子戰變了態度，很怕局部化不易維持。他現在的看法是，至少在短時期內，戰術與戰略的平等，或互相制阻的武力，使戰爭不致發生。去年十二月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國防部長在北京會議，決定在歐洲萬一有事，可以使用美國在德儲藏的戰術原子彈七千枚。美國希望這樣既可以遏止紅軍的攻勢，他方面亦可以表示它的赴戰決心，使克里姆知難而退謀求解決爭端。最危險的是如果雙方互放戰術原子彈，逐步增加其彈型和炸力，最後是可以變為原子總體戰或全面戰的。

葛氏贊成美政府發展 ABM 武器體系 (即抵

抗蘇聯飛彈攻擊的防禦武器體系)。他覺得美國戰略既是全面反擊，那末，保護原子飛彈基地實屬必要。他說：就目前說，美蘇兩國都具有互相摧毀的力量，即彼此再擴張原子武器，也增加不了彼此的安全。美國過去喜唱原子武器的『優勢』，現在改為『充份』了。

外交顧問觀察目前情勢有兩個特點：(一)無論國家怎麼強，很難保障它的領土不受侵犯。(二)在今日洲際飛彈與消息傳達迅捷的世界，美國的安全真可以說是切國家的安全。因此，如果我們的目的只是安全，那末，推論結果，我們就應該考慮到它們的安全。

對越戰看法——葛氏的著述很少涉及亞洲問題，但是最近他表示：『亞洲的紛擾不純是思想問題，而實是一個沒有均勢的問題。這是七億人口的中國的結果。姑無論其政府何若，但是他們站在政府的後面』。

關於越戰，他是老手，除前駐越南大使與巴黎和談代表 Henry C. Lodge 外，恐怕很少美國人像他這樣熟悉內情的了。一九六五年他赴越南調查實況，翌年他又赴西貢，籌備詹森總統與越南領袖在馬尼拉會議。一九六七年他設法邀請胡志明的法國朋友飛赴河內訪胡，探詢和談的可能性。事雖流產，但這是外間傳說他曾赴河內之所由來。

去年正月美國外交季刊登載他一篇論越戰的文章，這是在就外交顧問職以前寫的。他說美國傳統戰略是不適用於游擊戰的，河內的優點是地形熟悉，軍事政治能够互相配合。世界輿論

與美國國內反戰的壓力，可以迫使美軍撤退，它的弱點是物質缺乏軍火須靠外援。美國的弱點是大軍遠征，勞民傷財，戰略與政治外交往脫節，但國力極強，北越絕無戰勝美國的可能。既不能勝則祇有和。

他對詹森總統的越南政策非常憂懼，但從未公開批評。他覺得美國無論如何，不能接受軍事的失敗，及准許外力推翻南越政府。北越的軍事壓力消除後；美國並無用武力維持西貢政府的義務。因此，美國的目的有二：(一)北越與美軍逐漸撤退；(二)設法使南越的各種政治勢力自謀解決其政治問題。他主張軍事問題由美國與北越直接協商，越南的內政，美國最好避免介入。此外，美國，河內，西貢與南越共黨同意設立一國際機構，以保障協定的實行及監視已撤退的北越軍隊不再進入南越。

難者問：為什麼河內要接受這種解決辦法。他答：北越既沒有力量可以迫使美國撤兵，那它祇有同意這種辦法，才能使美軍離境。如果它堅求全部勝利 (按即美國投降)，則戰事祇得繼續，而美國方面祇有盡其所能自行設法，完成其目的。(一)採行一種減少兵士傷亡的戰略，(二)集中全力，保護人民，以消滅共產黨的政治資本，(三)增強南越軍力，以便美軍能逐漸撤退，(四)西貢政府應擴大其政府基礎，以便增強其地位，及將來與共方決一雌雄。

葛氏認為榮譽的終止越戰實為世界和平所必需，唯有和平，越南人民才有機會尋求他們自己的命運。

去年五月十四日尼克遜總統在電視演講其越南政策，聽說其講稿是葛氏幫忙寫的。我們看一年來美國的種種新作風，則蛛絲馬跡實不無可尋之處。

外交警語——葛氏精通外交學識與史實，他對美國外交發出不少警惕的話，不少是有意義的教訓，略述如下：

美國外交缺乏想像力和創造性。歡喜日常應變的實際主義，而無深遠計劃。

美國外交政策有一個極重要的任務，就是培植穩定的信譽。我們對敵人是否危險，這很難說，但對朋友困難重重，却了無疑義。

原則無論如何高超，但在某種程度總得與實際相連。歷史昭示：國際安定時與均勢相照，唯有均勢才使霸道發生困難。注意本身利益不一定是道德，因為道德的效果可以導源於有利益的行動。比方過去英國直截了當的說明不許任何一國獨霸歐陸，雖是為它本國，但有助於國際秩序的維持。因此，美國新政府（係指尼克總統）面臨的挑釁，是如何使我們的國際負擔和利益，及我們的義務和目的相關連。

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角落，及同一時期，採取明智的行動。

美國在全世界有四十個盟國，許多盟約束縛它負有軍事動作的義務。其中有些盟國是彼此仇視的，錯綜複雜，難以言喻。而國際局勢變幻無常，政府應該每十年來一個總檢討，評定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定義。

上兩次世界大戰，有盟國擋前鋒，美國得

而從容準備，以其龐大國力，最後參戰擊敗強敵。現在美國已不能佔此便宜了，國土也可以同樣遭受摧毀，但是美國人是最難瞭解慘劇的可能性的。

美國最好少過問他國的內政。有些國家以為它採共產主義或接近蘇聯，其對美國為害之大甚於它們自己，這無非是旨在威脅討價罷了。有些新興國家的領袖似乎深信膽大冒險的外交不會損害其經濟發展，反而會促進其發展。超級強國競爭討好，經濟外援便會源源而來，姑無論他們行動如何。他們的外交愈無顧忌，超級強國的討好遠景亦愈大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廿年內，美國到處受人歡迎，這最適合美國人處理國際關係的實際主義的脾胃了。到了一九六〇年後，形勢複雜起來，美國的地位已不能應付全世界了。現在一九七〇年度，在物質上，我們雖為超級強國，但是我們的策劃如未能得他國的竭誠合作，便失去意義。我們可以繼續協助其防守與積極的政綱，但應鼓勵——不是窒息——其負起地方的——即自國內部的——責任。我們的協助不當為唯一的或主要的努力，而應為成敗的差異點。（作者按：去年夏間美總統在關島發表的亞洲政策，要求亞洲國家自己處理國內事務，似基於上述觀念。）

美國民間有一種傳說：他國有的是利害關係，而我們有的却是責任。我國有一種趨勢，就是把利人主義，當作是信賴我們的擔保。前任國務卿魯斯克（Dean Rusk）有一次說得好：『我們和共產主義並沒有什麼爭吵，有爭吵都是為了

他人。』

人類歷史上，使用武力既可以成爲先例，這無異證明武力可以實現國家的目的。到了廿世紀，使用武力反抑制人家不敢再訴諸武力。姑無論越南戰爭結果如何，美國人民不願再在任何其他地方，從事類似形態的戰爭，那是顯而易見的事。美蘇兩國儘管鬧，但有一共同點，就是彼此都不願有原子戰。

美國外交與戰略應該顯明。歷史學家說：如果當時美國態度顯明，兩次世界大戰也可以避免發生，美國人民應以此爲戒。

結 論

作者覺得葛辛基自進白宮以來他的外交主張發生了不少的影響力。雖不易言全部，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，他的思想能與總統的照會，而又得其信賴。他的外交顧問職可以終尼克遜的四年任期，甚或八年，如再當選。他以改造國際結構及觀念爲己任，認爲唯有此，才能確固世界和平。他構思獨立而自由，主張美國外交需有想像力與創造性。他終日忙於行政事務，究竟還有多少時間許他靜坐沉思，這倒是一大問題。

寫至此，作者有一感想，即美國移民政策的大成功。如果不是大量移民，美國可能現在還是一塊印度紅種人過着野蠻生活的荒野；多少偉人，科學家，學者，藝術家，及實業家……都是由他國移植來美的，葛辛基僅是最近來美的一位而已。

一九七〇年二月紐約